

走投无路的思想

我是“思想”，虽然高贵，但只有借助于人才来到世界。我决定去寻找最需要我的人。

我首先走进了作家的房间。从他紧皱的眉头上，我知道他正在思考。

“我来了。”我说。

“你是谁？”

“我是思想，一个极为独特的思想。”

“哦，那请你走开。”

“如果让我走进你的作品里，会让你的作品熠熠生辉。”

作家说：“请问，你能让我的书畅销吗？”

我想了想，说：“我不知道。我能做到的只是让你的书变得深刻。”

作家说：“我已经出了8本书，销售了9百万册。我靠的可不是什么独特的思想，而是独特的情节；独特的官场格斗，独特的床上故事，独特的谋杀案件。”

接着，我走进了市级领导的办公室。他正在看秘书给他起草的报告。

“我来了。”

“你是谁？谁让你来的？”也许没有预先通报，对我的到来，他显得很生气。

“我是思想，一个极为独特的思想。”

他的脸变得苍白，手中的报告滑落到桌上。“你想干什么？”他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看了秘书给你起草的报告，觉得它像你此时的脸色一样苍白。因而，我希望你让我走进你的报告。”

“不，不，不，我决不能让你走进我的报告。”

“假如我不走进你的报告，你的报告只能让人昏昏欲睡。”

□ □ □ □

学口哪儿的话

我有一个同学比较早婚早育，孩子现在已经差不多能打酱油了，而他最为烦恼的，就是孩子的口音问题。

最初的烦恼是保姆，保姆是山东人，带了孩子几个月，教了孩子一嘴“大葱味儿”。同学的老婆不干了，为了口音，把保姆辞了。但随后烦恼又来了，这次却是姥姥。姥姥是山西人，孩子口音里又有了老陈醋的味儿。可是姥姥总不能辞退，同学老婆只好说：“为了孩子，您就当自己是哑巴行吗？”姥姥之后，祸根就变成了偶像——这孩子崇拜上了小沈阳，说话就开始有“大米渣子”味儿了。

“北京的语言环境太差了。”同学感叹，“口音太杂。”

我说：“那你希望孩子说哪种口音呢？感冒味儿

□ □ □ □

据媒体报道，美国田纳西州一户居民家中失火，户主向附近南福敦市消防队求救，消防队赶到现场确认屋内无人后，眼睁睁看着大火将房屋烧成灰烬，其原因是该户居民未缴纳市政府规定的75美元消防年费。

美国也终于爆出了体制问题！相信这是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尽管缺乏一点“人情味”，但这是规定。美国消防队宁愿画地为牢，不肯越界救火，于事主固然难以接受，于社会效益上却可避免违规者形成示范带动，收获的是更多人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对游戏规则的尊重。

正如南福敦市长大卫·克罗斯所说，“如果消防队员为没交钱的人救火，其他人也都懒得交这个钱了”，但如果有人身陷火海，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消防队必然伸出援助之手，这就是消防队仍然赶到火灾现场的原因。

力之不张，人之恶必显。这场美式消防事件给我们上了生动一课：与其在潜规则可畏的社会里人人自危，不如在规则可畏的世界里人人自重。（摘自《科学时报》道田/文）



“是的，你说得没有错。可你应该知道，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效果。因为能让人昏昏欲睡的报告，对我才是最安全的。”

接着，我找到了一位学者。

此时，他正坐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

“我来了。”

“你是谁？”

“我是思想，一个独特的思想。”

“啊，思想，独特的思想，尊贵的客人！你能光临寒舍，真让我欣喜万分。”

这让我感到有点兴奋。我正想开口，他又接着说：“不过，你最好是过几天再来，因为此时我正忙。”“你忙，那我们可以先简单地交谈几句。”“也不行，我很忙。明天，我要出席论坛作学术报告，必须赶紧将稿子写出来。”“那好呀，我可以帮助你呀。”

“不，你不能帮助我。我必须依据董事长的意图写。”

“我实在不明白，一个学者为何要根据董事长的意图写学术报告。”

“因为我是这个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还是不明白。独立董事要独立呀，为什么要根据董事长的意图写报告呢？”

学者脸色有些发白，讷讷地说：“我跟你说不明白。”

离开学者所住的别墅，我在大街上踽踽而行。

（摘自《幸福·悦读》2012年第2期 汪强/文）

的老北京话吗？那只能到二环路里面学去了。”

“不不，胡同北京话也透着粗俗。”同学说，“我只是想让他学好标准的普通话，字正腔圆，就像英语的牛津腔那样的感觉。”

原来他认为这种口音是高档的。但孩子尚小，不够资格去上广播学院，同学最后使出了狠招，每天晚上七点，把孩子按在电视前面听新闻联播，海霞或李瑞英说一句，就得重复一句。

终于，孩子在众多口音的混杂中走上了正道。不过上了幼儿园以后，同龄的孩子不爱跟他玩儿，因为他嘴里常常冒出一些“亲切会见”、“友好交流”、“重大成就”之类的大字眼儿。

（摘自《廉政瞭望》2012年13期 顾儿主/文）

□ □ □ □

一个下午，我的先生去公寓办公室交下个月的房租。

我们住的这个公寓，老板是一位美籍华人。他置下这份产业，雇了方先生夫妇帮忙管理。方先生两口子是台湾地区来的移民，跟我的先生很谈得来。

公寓位于名校百利高中学区，住了不少中国人。

先生回来了，一进门就

特别激动，他气急败坏地说：“我们大陆来的住户里，有一个人，太不像话了。”

他说：“今天，我一到办公室，方经理拿出几个铜币崩儿，问是不是中国大陆的钱。我一看，是人民币5分钱的硬币。方经理一听，脸就挂下来，今天早上，来收洗衣机钱的老美，拿了几个不认识的硬币，问是哪个国家的钱。”

公寓为大家提供的洗衣机和烘干机都是公用的，每台机器的开关处，装了一个收银器，投进去三个25美分的硬币，机器就会自己启动。中国大陆用的5分钱硬币，跟25美分的铜币崩儿差不多，只是中国的硬币稍微轻一点儿，如果收银器只认尺寸和形状，根本区分不出来。

显然，住在我们这里的中国人，有一个人把5分钱的人民币，当成25美分来蒙混。

真是太让人气愤了，要是穷，出不起洗衣的钱，可以在家里用手洗，为什么要丢中国大陆人的脸面呢？

先生提议把公寓里的中国人召集起来，开个会。这

朋友是某小单位的“头头”，一把手，每每谈起单位的事，总是紧蹙眉头，连连摇头，叹说：“小人太多！”因为，总有人写匿名信给上级投诉他“任人唯亲”、“一言堂”。我侧面和他的一些部下聊过这些事，大家的一致意见是说这老兄作风霸道，缺乏民主；而且，并不认可他所说单位“小人”多的事实。

从心理学上分析，所谓“小人”，多是人格或心理上出了毛病，比如见不得别人好，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强。每到有利益分配之时，总会怀着羡慕嫉妒恨，先发制人，制造点事端，把可能潜在的对手打下去，把水搅浑。小人哲学是：我得不到，也别让他人好过。

但是，事物的复杂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单纯。许多“小人”，往往是“君子”制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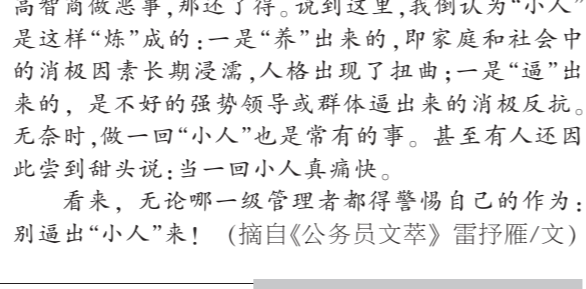
看到报端常登载父母诉孩子学坏，偷东西、说谎、逃学、离家，像是一群“小人人”，让人厌恶。但调查以后得知，这些家庭，多是父母太强势，总是逆着孩子的心性，要他这样，要他那样，否则便轻则斥之以恶言，重则饱之以老拳；这样，孩子只能选择“软报复”。偷改学习成绩，或编造故事，骗以谎言。这些“小人人”一旦成人，心病成了痛疾，难免真成了“小人”，会干出一些危害别人之事。

单位也和家庭一样，有些领导作风民主，主事公道，事事摆到桌面上，别人背后说话的机会就少了。如果是霸道之徒占了第一把交椅，把部下不当成“同事”，只当做执行命令的“奴仆”。部下每每因言获咎，日积月累，怨气加重，便埋藏下一场“不对称战争”，许多正常的人也不得不认同“小人”行为，用一些不合规范的方式，或消极或偏激地制造些不安定来。

“小人”是食品里的三聚氰胺，空气里的二氧化硫。毒化环境，又难以治理。在这种氛围里，“领导者”的交待就算不倒，也会摇摇晃晃。以此而论，你的“小人”，是你自己制造的。你在享受“霸道”生活的同时，也在为自己制造着身败名裂的灾难。

从这一点说，民主也许是医治“小人”现象的良药。人性的善恶，争论了几千年，难有确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人性中既包藏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如果以善对善，将人性中的善激活了，便一好百好。如果挑起恶来，大家便以恶对恶，各人都以最高智商做恶事，那还了得。说到这里，我倒认为“小人”是这样“炼”成的：一是“养”出来的，即家庭和社会中的消极因素长期浸濡，人格出现了扭曲；一是“逼”出来的，是不好的强势领导或群体逼出来的消极反抗。无奈时，做一回“小人”也是常有的事。甚至有人还因此尝到甜头说，当一回小人真痛快。

看来，无论哪一级管理者都得警惕自己的作为：别逼出“小人”来！（摘自《公务员文萃》雷抒雁/文）



个社会是讲诚信的，中国人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而且也要为华人的名誉负责。

“你们为什么这样气愤呢？”孩子突然这么问。

跟我们大人相比，他显得非常平静。

“每一个种族，都有好人、坏人，都有水准高的人，也有水准低的人。这是正常的事儿，在美国人里面，也是这样的啊。”孩子劝我们，“我不觉得因为这个人做了不对的事儿，就会毁掉中国人的声誉。”

孩子看问题，好像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美国人都跟他的想法一样啊？

后来，我发现大多数美国人，真是这样想问题的。他们甚至认为，如果将某一个人的行为，跟一个种族联系起来，那就是种族歧视。

有一次，朋友告诉我，他建议老板雇两个墨西哥人，前来打扫卫生，因为“老墨的劳动力便宜”。老板非常严肃地告诉他：“这是种族歧视，你可以说雇某个人工资便宜，但是，你不能说雇老墨就便宜。”

我原来以为自己特唯物，可是，孩子对待“5分钱硬币”这件事情的态度，让我开始怀疑自己。我一味地追求所有中国人的完美，是不是很难心、很沉重？孩子反而很唯物、很放松？

我建议提议的这个会，后来没有开。（摘自《青年博览》季家凰/文）

15 责编 / 刘文 美编 / 胡晴 照排 / 姚慧 校对 / 钟智勇

1977年震惊全国的高考舞弊案

1977年秋，邓小平宣布恢复高考，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闸门终于再次开启。然而，在这次恢复后的首场考试中，发生在江苏灌云县官员集体改分案，给这个本已经十分特殊的第一届高考，抹下了灰暗的一笔。

官员改分“公开化”

11月28、29日，江苏淮阴地区灌云县高校、中专的高考初考如期进行。统考名单于12月16日公布后，陆续有人民来信，12月17日上午，龙苴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刘如山、公社党委组织委员李德学两同志打电报给当时的国家最高领导人，揭发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淮阴地区招办于1977年12月19日进行调查。随着调查的深入，真相被一步步揭开，其中的情节恶劣程度令人咋舌。

1977年11月29日，江苏省高考初考结束后，被抽调在灌云县运动办公室的文教局中教股股长常鑫，亲自找到县招办文考组组长、文教局中教股副股长何声，要何声对其孩子常亢多多加心，让其参加统考。

开始录分的第一天下午，何声到录分室想了解常亢的初考成绩情况，当录分员单言看到常亢的数学考分只有6分时，就拿给何声和录分员历水看，这时，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负责登记录分表的单言问：“照写还是怎么办？”何声说“加点”，并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圈。单言问：“加零啊？”何声说：“行。”单言就在“6”字后面加个“0”字，变成了60分。

当晚，历水把何声指使人改分问题报告了文教局小教股股长、招生秘访组方雨，方雨于第二天上午报告了县文教局副局长、招办主任黎霄，黎霄听后未追究就算了。

这件事情很快在录分员中传开了。当时有的人为何声的做法捏了一把冷汗，但没有看到领导追查制止，也就不在意了。

于是，有的录分员就开始暗暗地把自己关心的考生分数改动了。更有甚者，黎霄亲自出马，明目张胆地把老首长、老同学、老部下托其关心的写在三张活页纸上的四



父母的工作机关，要把我接回去，因为机关里吃不饱，父母快养不活我了。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是我们那个村里的大明星，方圆五十里的乡邻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其知名度相当于今天的朱莉娅罗伯茨。这个身高只有一米五几，没读过一天书的女人，一直是东家们争相抢夺的短工，因为她和最得力的男劳力一起下地，三里长一垄麦子，她割完了，男人也就割到一半。

后来我问她，你割麦子为什么会那么

快。祖母就说：“一直割到底，中间不要直起腰来。因为如果你直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你能想象一个矮小的女人，挥起镰刀，被遥无边际的麦田掩蔽的情景吗？

但就是她和她身后的麦田，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在她的身上集中了美好女性的所有优点：勤劳、智慧、幽默、不说废话，以及非凡的气质。

祖母让我知道了自己是个笨人，是从乡下走出来的土包子。正因为我知道自己笨且土，所以我就一直以祖母为榜样，在干活时尽量不直起腰来，所以我能进北大，才有机会混迹文艺圈，并找到了一个让我心甘情愿扮演傻子的**那人**。（摘自《楚天都市报》刘震云/文）

据台湾作家廖信忠回忆：在戒严时期（1949—1987年），台湾当局不但要严防“共谍”渗透，更要防备对岸的思想，不仅是书籍，音乐也被政治审查。当时，国民党当局实施歌曲审查制度，未通过的歌曲要修改到合格才可以出版。审查歌曲每周一次，1979年到1987年共审查了320期，930余首歌曲遭禁。

歌曲被禁的理由不一而足，有的被认为是意淫、文词轻佻、妨害社会善良风俗的“靡靡之音”，有的则被认为是为“匪”宣传、隐合政治暗示等。“我的热情，啊，好像一把火……”这首后来热到大陆的《热情的沙漠》被禁的理由是，当局认为歌曲中的“啊”太淫秽，容易让人产生性幻想。邓丽君的《何日君再



十多个考生名单交给录分员历水，并作交代说：“如果他们分数不够的话，把他们提到分数线上。”历水又把黎霄交的名单，按公社分别写成若干小纸条，送给各个录分小组，并把黎霄的说法作了交代。招生委员会副主任王飞已经发现录分表上有的考生分数被涂改，还没有意识到有人有意改分，不仅没有深究，还把县委一个负责同志小孩和卫生局一副局长两个小孩参加统考的问题，向录分员历水和程高打了招呼，叫“给他们统考”。驻县的招生工作组长江斌在录分室也发现录分表上的考生分数被改动，却认为是因录错分数改动的，没有引起有人乱改分的警觉，未加追究。同时把工作组人员找其关心的14名考生分数，记在本子上拿回给工作组组员翻看。

这个时候，改分已经“公开化”了，参加录分的11个录分员，有10个人除替领导叫其关心的考生改了分以外，还把受人家委托和自己觉得该关心的考生基本上都改了分。文考组组长何声就亲自改了二十多个考生的分数，其中一个中考生苏发是何声的内弟，总分由89分，改加到134分。就这样，全县总共改动分数的考生达273名，其中，在分数线以下加分的229名，在分数线以上加“保险分”的44名。

权贵打压合格考生

在评阅初考试卷的时候，灌云县所在的淮阴地区下达了评卷标准，但王飞等人却不执行，他在评卷教师会上说：“不要把分数压得过低，过低了我们县会吃亏，参加统考的人数少了，录取的人也会少。”

当黎霄到地区汇报初考成绩时，有人交待说：“不要先汇报，听听别县情况。多争取一些人参加统考。别的县分数高，我们如悬殊太大，也可以把分数适当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大量改分，他们就把该县初考合乎地区规定的分数线以上的考生857人，虚报为1176人，谎报了319人。

王飞、黎霄等人骗取参加统考的名额后，又擅自决定



1972年，中日关系实现了“破冰”。我（指周斌，下同）有幸参加了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谈判在中国的所有活动，至今回忆起来仍感慨无限。

田中反复强调自己年轻

田中角荣走下飞机的时候很紧张，态度也显得生硬。他见到在飞机舷梯旁迎接他的周恩来总理后，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田中角荣，54岁就当上了日本首相”。接下来又重复了一遍。周恩来总理把田中角荣一直送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条件最好的18号楼。进楼后，田中角荣抢在我们翻译人员前面，主动去帮总理脱风衣，又说了一句“我54岁当上了日本首相”。我想，他肯定对自己54岁当上日本首相感到特别自豪。周总理好像不愿意再听这话了，笑着说：“田中先生，我51岁就当上了中国总理了，而且一直当到现在”。从此，田中角荣就不再强调自己54岁当首相的事情了。

“添麻烦”一词惹众怒
接下来几天是谈判。9月25日，在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田中角荣在致答谢词时，说他代表日本政府对过去给中国人民“添的麻烦”表示歉意。此言一出，立刻横扫宴会席间的“友好”气氛，中方所有出席者都愤怒起来。第二天，在首脑会谈中周总理对日方的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郑重提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说“添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是通不过的，而且会引起强烈反感。9月27日，为解决有关表述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与中国外长姬鹏飞在去长城的路上举行了一场“车中会谈”，我负责做翻译。会谈中，姬鹏飞提出“反省”和“麻烦”都过于轻描淡写。大平正芳说：“完全按照中方的要求，我们是没办法回日本的。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方面的意见写入《联合声明》里面，不要说谈不成，回去以后也很难交代的，我和田中角荣都得下台。我们如果下不了台，也就没有人有能够来执行这个《联合声明》了”。

换种说法签声明

我记得姬鹏飞回来以后马上向周恩来报告。这个问题当天晚上是必须解决的，因为第二天上午就要签署《联合声明》。那天深夜2时，参加谈判的人都靠咖啡维持精神，大平正芳拿出一张字条来，那字条的形状我都还记得。他说：“姬鹏飞外长，这是我们日本方面的最后方案。如果你们中方还是接受不了，还是不行的话，我和田中先生就只好打包回家去了。”那字条上面用日语写着“日本国政府对日本过去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后来，《中日联合声明》里采用的就是这个表述。

我记得当时有同事认为不能同意，因为没有“侵略战争”四个字。最后周总理说：“既然他们承认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他们也痛感责任，他们也深刻反省，这不就是承认‘侵略战争’吗？为什么一定要加这几个字呢？现在，田中先生和大平先生他们有困难，我们不应该为难这些准备解决问题的朋友们”。周总理在外交方面是有绝对权威的，他说话以后，就没有人争论了。（摘自《环球时报》7.12周斌口述 蒋丰整理）

忆

把一部分低分考生列入统考名单。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

“属于总分在分数线以下，未改录分表直接参加统考的有198名(高校84名，中专114名)，占营私舞弊总数的42%，其中正副局长级以上干部的子弟和亲戚17名，文教系统的26名，其他干部的77名。”

黎霄等人，为了把不合格的低分考生塞进去，参加统考，竟胆大妄为地把实考总分在分数线以上的433名(高校176名，中专257名)合格考生，非法地不让他们参加统考。其中15名考生的总分，被改到分数线以下，失去了参加统考的机会。如四队公社高校文科生孟庆礼，政文83分，数学55分，共138分，没有参加统考；白坨公社高校理科考生邹法实得总分114分，录分表上被减少50分……

最后，由于黎霄等人大肆改分，非法参加统考的考生总数高达471名，占灌云县参加统考人数(1131名)的41.6%。万幸的是，在调查组调查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对初考考分在分数线以下而未参加统考的，宣布一律无效；对被非法剥夺参加统考权利的考生，进行了补救。

事后相关违规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黎霄对此事负主要责任，给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的处分；何声负重要责任，给予开除党籍、撤销中教股副股长职务的处分；王飞也负重要责任，撤销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江斌同样负重要责任，接受请吃请喝，游玩连云港，并托人购买猪油、食糖、虾皮和酒之类的物资，留党察看一年。

这几人中，处分最重的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两年”。按现在的理解，处分过轻。不过回顾一下当年的背景，那是一个打下“政治挂帅”烙印的年代，如此的处理结果，无疑是宣布了一个人在仕途上的“死刑”，这样的处分其实已经很重要了。

（摘自《周末》陈璐 周益/文）

那事 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博弈内幕

那年